

评论《水浒》文集

— 3 —

安徽人民出版社

目 录

评投降派宋江.....	安 群(1)
宋江和高俅是一丘之貉.....	洪广思(12)
宋江是怎样搞投降主义的?	安徽劳动大学 江 南(20)
宋江的投降主义路线和忠君思想	安徽师范大学 闻 工(27)
评金圣叹腰斩《水浒》 ——兼驳胡适吹捧金批本《水浒》的谬论	闻 钟(32)
《水浒》与宋代的阶级斗争.....	杨荣国(42)
《水浒》和程朱理学.....	梁 效(48)
宣扬投降是对农民革命的歪曲	山东梁山县后集大队 《水浒》评论组(57)
投降派的典型 ——评《水浒》中的宋江	闻 津(62)

评投降派宋江

安 群

宋江是《水浒》作者全力歌颂的主要人物。这种歌颂应不应该？宋江究竟是革命派还是投降派？以往的评论很不一致。毛主席最近指出：“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我们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从路线上划清革命派和投降派的界限，从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揭露宋江搞修正主义、投降主义的真面目，并回答人们提出的一些问题。

一

《水浒》所描写的时代是北宋末年。这时，宋王朝的统治日益腐朽，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异常尖锐。在这种矛盾斗争中，围绕着是起义还是投降，在梁山农民起义军中展开了两条路线的斗争。宋江从开始反对晁盖起义，主张投降，到接受招安，去打方腊，一直到最后毒死李逵，所推行的完全是一条修正主义、投降主义路线，他是一个坚持奴才立场到底的投降派。

有人曾根据宋江放晁盖这件事，把宋江说成梁山革命事业的“奠基人”，似乎没有他，就不会有梁山农民起义。这种看法是受了作者美化宋江搞修正主义的影响。从阶级斗争的观点看，晁盖领导的黄泥岗暴动，才是梁山农民起义的真

正开始。在此之前，小说所描写的只能看作是整个故事的铺垫，是梁山农民起义的背景。有了这次暴动，才有晁盖等人的上山；有了晁盖等人的上山，才有梁山农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王伦占据梁山，只是“打家劫舍”。晁盖作了寨主，才有“共聚大义”的纲领和路线，梁山才成为各路起义英雄众望所归的根据地。所以，梁山事业的奠基人是晁盖而不是宋江。宋江放晁盖，只是叫晁盖离家避难，同时也使自己落个“仗义”的好名声，扩大自己在江湖上的影响；决不是站在革命的立场上，叫晁盖上山造反。这从宋江对待晁盖“劫取”生辰纲、带领起义队伍上梁山的态度看得很清楚。“劫取”生辰纲不义之财，宋江认为是“犯了迷天大罪”；擒何涛，俘黄安，杀官兵，坚持武装对抗，宋江认为这都是“灭九族的勾当”，“于法度上却饶不得”。可见他对晁盖聚众起义，压根儿就是反对的。所以，宋江极力要和梁山切断联系，宁愿自首吃官司，刺配江州，也不愿上梁山。这样一个封建统治阶级的忠实奴才，怎么能说成是梁山事业的“奠基人”！

宋江上了梁山，作了头领，是否就由不革命转向革命了呢？没有。他混进梁山革命队伍后，充当了地主阶级的代理人，继续经营他的反革命事业。晁盖一死，宋江立即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聚义厅是以晁盖为首的革命派坚持农民起义路线的象征。宋江这一改，标志着梁山路线的根本改变，灭了革命派的志气，长了投降派的威风。这个改变，是宋江搞修正主义的摊牌。如果说，晁盖在世时，宋江还有所顾忌，主要在暗地里培植党羽，进行破坏；那么，晁盖一死，宋江就明目张胆地亮出他那修正主义的招牌，公开“修正”晁盖的起义路线，强迫梁山农民起义军实行他的投降主义路

线。从此，这支革命的队伍也就一步一步地走上了毁灭的道路。

宋江处心积虑搞修正主义，究竟要“修正”什么呢？主要就是要**把晁盖既反贪官，也反皇帝，坚持农民起义的路线，“修正”为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争取招安的投降主义路线。**毛主席指出：“**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地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皇帝是地主阶级统治的总代表。因此，农民起义如果要向前发展，就决不会把自己的斗争只限制在反对几个贪官的范围内，而要发展到反对以皇帝为总代表的地主阶级的统治。尽管《水浒》的作者为了突出歌颂投降派宋江，有意少写或不写晁盖的革命思想和言行，但我们从书中只言片语还是可以看到，以晁盖为首的革命派是**既反贪官也反皇帝的**。晁盖上梁山之前，烧掉自己的庄院，武装抗拒官军的追捕，就表示了他背叛地主阶级、反对封建统治的义无反顾的决绝态度。他的绰号叫“托塔天王”。“天无二日，国无二君”，既要称王就不可能不反对皇帝。在**晁盖的农民起义路线**的指导下，朱贵喊出要“和大宋皇帝做个对头”。李逵多次提出：“杀去东京，夺了鸟位。”作者站在封建统治阶级的立场上，凭借反革命的嗅觉，也看到晁盖坚持的农民起义路线是以反皇帝为核心的。因此，惟恐晁盖“托胆称王”，就让他“归天及早”；而让所谓“呼群保义”的宋江来“把寨为头”。这个“忠为君王恨贼臣”的投降派一为头，就把梁山农民起义的斗争限制在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框子内，彻底“修正”了晁盖的起义路线，背叛了农民革命。

《水浒》为了宣扬宋江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投降主义路线，着重写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但是，这种斗争，正如

毛主席指出的，只不过“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与高俅由于所处社会地位和政治遭遇的不同，在实现自己的反革命政治野心和贪婪地掠夺人民财富上，存在着矛盾和斗争，形成了地主阶级内部不同的两个派别。而他们在反对农民起义上又是一致的。如果说有不同和有矛盾的话，不过是一个钻到里面反，一个站在外面反；一个属于招安派，一个属于围剿派。正是由于宋江的混入，里外配合搞招安，才扑灭了梁山农民起义的烽火。他起到了高俅所不能起的作用。招安派和围剿派在本质上又是共同的。宋江不反皇帝，结果受招安，去打方腊。这时，他同高俅一样，又成了围剿派，抓住起义的农民，剖腹剜心，表现了他的地主阶级的极端残忍性。象宋江这类混在农民起义队伍中的叛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到最后必然是不反贪官，不反皇帝，专反农民起义，充当封建统治阶级的鹰犬。这是搞修正主义的必然结果。

二

在政治上搞修正主义、投降主义，必然要在组织上闹分裂，破坏革命团结。宋江为了把梁山搞成投降派的山头，要尽阴谋诡计，排斥革命派，大搞招降纳叛。他是搞分裂主义的罪魁。

排斥晁盖。晁盖是梁山起义的领袖，宋江搞分裂主义，首先就把矛头针对晁盖。他借京师童谣这样的谰言，把自己吹嘘成天命攸归的领袖人物，为篡权制造舆论。为了达到排斥晁盖的目的，他玩尽了反革命两面派手法。每当梁山有重大的军事行动，宋江总是不让晁盖出马，说什么“哥哥是山寨之主，不可轻动”，表面上是尊重，实际上是架空，

叫晁盖成为徒具虚名的“空头司令”。而他自己带兵出征，俨然成了部队的最高统帅；得胜归来，又树起了自己的威

降纳叛”。宋江自己就曾得意地宣称：“你看我众兄弟们，一大半都是朝廷军官”。李逵的话一语破底：“山寨里都是你手下的人，护你的多”。这说明宋江为了实现投降主义路线，千方百计地拼凑成了投降派的班子，在组织上为受招安作好了准备。

有人曾经认为宋江这一切活动是为了“团结起义军”，这是离开了两条路线斗争看问题的结果。宋江为什么要梁山一百〇八人“对天盟誓，各无异心，死生相托，患难相扶”呢？是为了要大家死心塌地，听从他的摆布，服从他搞投降主义路线。投降派宋江要尽阴谋诡计，排斥革命派，篡夺梁山起义军的领导权，清楚地表明他不是什么梁山上“团结”的旗帜，而是搞分裂主义的阴谋家、野心家。

三

思想路线是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的基础。宋江搞投降主义，不是偶然的，是由他反动的地主阶级立场和世界观决定的，是他所信奉和宣扬的孔孟之道的产物。

宋江出身于地主阶级家庭，“自幼学儒”，“曾攻经史”，儒家思想根深蒂固。后虽混迹江湖，但“尽忠报国”，“青史留名”，仍然是他的“凌云志”。他上了梁山，手捧“天书”，满口“忠义”，一直是“身居水浒之中，心在朝廷之上”，地主阶级立场和世界观没有丝毫的改变。

宋江这个儒家之徒所信奉的主要是宋代的反动理学。宋代理学把儒家的三纲五常进一步绝对化，把它炮制成所谓“天理”，发挥了“天人合一”、“君权神授”的儒家谬论，认为“忠君”是顺“天理”的；反君是逆“天理”的。《水浒》成书于元末明初，深深打上了理学的烙印。它通过九天

玄女授“天书”、“石碣受天文”等荒诞的故事情节，大搞“天人合一”，把对皇帝“全忠仗义”与“替天行道”凝为一体。宋江正是这种反动思想的号筒。他认为效忠皇帝就是“顺天”，上梁山造反就是“上逆天理”。这就是他不反皇帝，接受招安，搞投降主义的反动思想根子。

封建统治阶级“把孔夫子的一套当作宗教教条一样强迫人民信奉”。只有冲破孔孟之道的束缚，农民才能起来造反；而农民起义又是对孔孟之道最有力的批判和冲击。因此，宋江要搞投降，就一定要拿起孔孟之道这个反动思想武器，在农民起义军中推行儒家思想路线。他依照理学的反动教条，不遗余力地把“天命”和“忠义”凝为一体进行兜售，给农民起义军重新套上孔孟之道的精神枷锁，按照地主阶级的面貌改造梁山农民起义军。

晁盖在世时，宋江遵照所谓九天玄女的“法旨”，宣扬“替天行道”，“尽忠报国”。晁盖一死，他就把“替天行道”的旗帜公开打了出来，作为投降主义纲领。正当梁山一百〇八人会聚的时候，他利用“石碣天文”进行欺骗，于是，在组织上把他自己和支持他搞投降的那一伙排在重要的“座次”上，就成为“天地之意”，谁也不敢反对了；在政治上他谋求皇帝招安的行径，也就成了符合“天命”，谁也不能非议了！我国历史上有些农民起义是利用宗教、借助“天”或“神”作号召的，但其目的是为了证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而宋江却借助天命来证明对反动派投降有理，真是反动已极！

宋江为了把农民军引上投降的道路，还千方百计叫大家“共存忠义于心”。把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这是他在梁山上公开挂出的“忠义”招牌。“忠义双全”，这是他为农民起

义军确定的指导思想。“但愿共存忠义于心，同著功勋于国”，这是他要一百〇八人共同遵守的誓言。宋江平时“忠义”不离口，直到临死还恬不知耻地说：“我为人一世，只主张‘忠义’二字”。他所谓的“忠义”，并不象有人所说的是“忠义”于梁山的革命事业，而是根据所谓九天玄女“为主全忠仗义”的“法旨”，忠义于大宋皇帝。其目的，就是要用“忠义”这条绳索把农民起义军捆绑起来，掷到最高封建统治者的脚下，使他们重新遭受地主阶级的剥削和奴役。

但是，“忠义”，特别是“忠君”思想，和起义农民长期养成的敌视压迫者和剥削者的心理，是不相容的。宋江贩卖的这一套，也不是处处都能为起义军所接受。即使受招安之后，反对儒家“忠义”思想在一些人中也还存在。“燕青秋林渡射雁”，不过是从空中射下一些雁子，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可是，宋江却借题发挥，又是吟诗，又是作词，大讲特讲“仁义礼智信”。这正是因为受招安之后，投降和反投降的两条路线斗争并没有结束。当时，李逵等革命派不愿意投降，“反心尚兀自未除”，一再想反上梁山。宋江感到单用“忠”字笼络不住众人的心，很有必要加强儒家思想的全面宣传，进一步用儒家的“五常”和“忠义”一起来禁锢他们的反抗精神，摧毁他们的革命意志。如果说在招安之前，他推行儒家思想路线是为了把农民起义军引上阶级投降和忠君的死路；那么，在招安之后，他继续推行儒家思想路线则是要他们投降到底，当奴才到底。

宋江推行的这一条儒家思想路线，简直是一服烈性毒药。梁山农民起义军之所以会和平演变成地主阶级的官军，正是吞下了这服烈性毒药的结果。要坚持革命，反对投降，必须彻底批判孔孟之道，这是一条重要的历史经验。

四

毛主席指出：“《**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水浒**》的投降主义总倾向是通过歌颂投降派宋江来表现的。因此，揭露投降派宋江的真面目，对于认清《**水浒**》是一部宣扬投降主义的反面教材，极为重要。

在文艺作品中，“**主要人物是一定的阶级和倾向的代表**”（《恩格斯致斐·拉萨尔（一八五九年五月十八日）》）。以晁盖为首的革命派是农民阶级的代表，坚持的是农民起义路线；以宋江为首的投降派是地主阶级的代表，推行的是投降主义路线。可是，《**水浒**》却把宋江及其投降主义路线放在矛盾的主导地位，贯串全书的始终，这就决定了全书的总倾向，必然是贬晁扬宋，丑化革命派，歌颂投降派，宣扬投降主义。

一部《**水浒**》，对宋江竭尽美化之能事：无耻的叛徒被颂扬为梁山的“恩主”；皇帝的奴才被美化为“能救万物”的“及时雨”；反动的投降主义路线被写成了上符“天意”、下合“人心”的正确路线；受招安的丑剧被夸耀为梁山革命根据地的盛大节日。《**水浒**》通篇到底，对宋江及其修正主义、投降主义路线，全是歌颂，没有批判。有人曾经认为《**水浒**》写了宋江吃御酒而死的结局，就是对“投降主义批判”。事实并不是这样。象《荡寇志》那样，写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个个长命富贵，固然是一种露骨的反革命的歌颂；象《**水浒**》那样，写宋江以身殉投降主义路线，也是一种隐蔽的反革命的歌颂。它写宋江对投降主义路线宁死也不动摇，毒酒入肠后，还不忘亲手毒死“情分最重”的结义兄弟李逵，甚至写宋江之死，竟然感召了不愿意投降的吴用自

缢于墓侧。就这样，作者呕心沥血表现了宋江对投降主义路线的死而后已的忠诚，最后完成了这一个“全忠仗义”的投降派形象，达到了歌颂的顶点。

晁盖、李逵、吴用、三阮是好的，不愿意投降。但是，这些革命派却被贬低、被歪曲、被放在陪衬的地位。“**群晁盖于一百〇八人之外**”，便是《水浒》作者贬低革命派很隐蔽也很恶毒的一手。不论是在《水浒》成书前的《宣和遗事》和龚圣与的《宋江三十六人赞》中，还是在成书以后的明人杂剧《豹子和尚》中，三十六人内都有晁盖。可是，《水浒》作者把很多记载和传说都篡改了，**群晁盖于一百〇八人之外**，列宋江于一百〇八人之首，把他作为主要人物来歌颂，甚至把元曲中的晁盖打祝家庄，也偷换成为宋江打祝家庄。成书前的很多记载传说都是说晁盖反皇帝，宋江不反皇帝，一直到明末张岱的《水浒牌四十八人赞》还是说晁盖“盗贼草劫，帝王气象”；说宋江“忠义满胸，机械满胸”。正因为这样，所以《水浒》贬晁扬宋，其目的是为了突出投降派，宣扬投降主义。

《水浒》是一部宣扬投降主义的作品，是一部反面教材。但是，以往对《水浒》的评论中，有很多由于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对宋江作了错误的评价，看不清《水浒》宣扬投降主义的总倾向，分不清路线是非。买办文人胡适曾经用唯心论的观点来研究《水浒》，给一些人的影响是很坏的。胡适从一九二〇年起写了几篇关于《水浒》的文章。他站在帝国主义奴才的立场上，用“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唯心论的实用主义方法，歌颂宋江是“永不会磨灭的英雄人物”。在当前深入开展对《水浒》的评论中，有必要结合批判胡适的唯心论，肃清其流毒。

《水浒》评论的历史和现状，充分证明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让我们通过对《水浒》的评论和讨论，进一步掌握马克思主义的锐利武器，在上层建筑领域内加强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把反修防修的伟大斗争进行到底。

（《红旗》杂志一九七五年第十期）

宋江和高俅是一丘之貉

洪 广 思

毛主席指出：“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这一指示，深刻地揭露了《水浒》中宋江这个投降派的阶级本质。批判宋江的投降主义，必须遵循毛主席的指示，认清宋江与高俅之间矛盾的实质，揭露宋江的地主阶级的本来面目。

宋江和高俅是地主阶级内部两个不同派别的代表。高俅一派，包括蔡京、童贯、杨戩等，是朝廷里的新老权贵，是地主阶级政权中的实权派。宋江、柴进等人，代表地主阶级中不掌实权的一派人的利益。马克思曾经指出：由于政府“拥有令人倾心的官职、金钱和权势，它变成了统治阶级中各个争权夺利的党派和冒险家彼此争夺的对象。”高俅一派“专权”，宋江一派争权，彼此之间或明攻，或暗算，为保持和争夺政治权力而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搏斗。

高俅由一个“浮浪破落户子弟”，一下子变为殿帅府太尉，是个平步青云的封建地主阶级新权贵、暴发户。他上台后立即和蔡京、童贯、杨戩等老权贵们勾结起来，千方百计安插亲信，排斥异己，拚命地保持和扩大他们的权力。蔡京做了太师，儿子蔡焕章是富庶之地江州的知府，女婿梁中书任北京大名府留守司留守，“上马管军，下马管民”。高俅新发迹，“不曾有亲儿，无人帮助”，就把他叔叔的儿子认

做干儿子，把他的叔伯兄弟高廉提拔为高唐州知府，真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他们通过这样一条“非亲不用”的路线，掌握了上至朝廷，下及州县各级官府的大权，不仅残酷地搜刮百姓，压迫人民，而且对地主阶级中不利于他们实行“专权”的一些人物和派别，也百般地排斥压制，“但有人小小触犯”，“要杀便杀，要刷便刷”。

宋江一派在被压迫人民面前是老爷，是财主，和高俅等人同样残酷无情，但是由于不掌握实权，他们在和地主阶级实权派的斗争中处于不利地位。他们累受高俅一派的打击排挤，对于权力就更为倾心，就更加激烈地同高俅一派进行争夺。他们或则习经，或则练武，企图通过自己的“本事”爬上去。宋江就自称“自幼曾攻经史，长成亦有权谋”，想凭这些得到朝廷重用。然而，他们越有“本事”，越有“权谋”，也就越受到排斥、压制。所以，在同高俅一派争夺权力的斗争中，他们一次次地败下阵来。为了在封建政权中争得一席之地，他们“恨不得杀了”高俅等“贼臣”。

政治和经济是互相联系的。地主阶级内部各派间争夺政治权力，是为了便于在经济上肆意地聚敛财富，而财富的积聚又可以使他们谋得更大的权力，榨取更多的民脂民膏。宋江和高俅两派在争夺政治权力的同时，还在财产占有上进行了激烈的争斗。从殷天锡霸占柴进之叔柴皇城房宅园亭一事，就可以看出他们在经济上是如何地互相倾轧、互相咬噬。殷天锡是高俅的叔伯兄弟高廉的妻舅。高廉“倚仗他哥哥势力”做到高唐州的知府并兼管兵马。殷天锡“又倚仗他姐夫”的“权势”，在高唐州“横行害人”。他看中了柴皇城的花园水亭，就带领一帮爪牙去夺占。柴皇城作为后周柴世宗的后代，“家间祖上有陈桥让位之功，先朝曾敕赐丹书铁券”。

但是，由于不掌握实权，柴皇城不仅被殷天锡“毆死”，家私还被“抄扎”，房屋园亭也被霸占。在这场争夺中，柴进一再抬出“丹书铁券”，甚至还扬言要到京师拦驾告御状，然而，其结果自己反倒被关进了死牢。从这幕丑剧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宋江和高俅两派在财产占有上的尖锐矛盾。

显然，宋江一派和高俅一派的斗争，归根结底就是小狗大狗饿狗饱狗之间的一场争斗。

既然如此，宋江为什么又上梁山，参加农民起义军呢？地主阶级利益的代表，跑到和地主阶级根本对立的农民革命阵营里面来了，岂不矛盾？对于这一现象，我们应该也只能从当时社会的阶级斗争环境中去寻找答案。

“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其它一切社会矛盾，包括地主阶级内部的矛盾都要受这个主要矛盾的影响和制约。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这一主要矛盾的激化，必然促进地主阶级内部矛盾的加剧。而在农民革命的滚滚浪涛冲击下，地主阶级内部斗争中的一些失利者，往往会混进革命队伍。这种现象在历史上并不罕见。《水浒》中的宋江一派，就是在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斗争和地主阶级内部斗争都十分尖锐，两者互相影响、互相作用的情况下上梁山的。他们上梁山，既是出于打击地主阶级中的对手，以谋取自身的特殊利益；又是出于搞垮农民起义，维护整个封建国家这一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混入革命队伍，出卖革命，镇压革命，这就是一部《水浒》中宋江一派所表演的反革命三部曲。

宋江一派是地主阶级的一部分，无疑是农民革命的对象。农民起义对于他们“挥金似土”的寄生生活，以及剥削压迫劳动人民的政治地位，造成了严重威胁。这就决定了宋江一

派敌视农民起义的根本立场。但是，由于阶级斗争和地主阶级内部矛盾日趋尖锐，呈现出一种错综复杂的状态，所以宋江一派对待农民起义的反动立场尽管是一贯的，而具体的态度和手段却十分阴险狡猾。

宋江一方面公开反对和咒骂梁山农民起义，恶毒污蔑晁盖等开创梁山革命事业是“上逆天理”，犯了“迷天大罪”，“于法度上却饶不得”，反革命旗帜十分鲜明。另一方面，却又广为“结识江湖上好汉”，“仗义疏财”，施小恩小惠，搞拉拉扯扯，骗取一些“江湖豪杰”的拥戴。这是因为，在地主阶级内部弱肉强食的斗争中，宋江一派很清楚自己所处的不利地位，所以他们一开始就把利用人民革命力量以为佐援作为一项斗争策略，在公开敌视、诅咒农民起义的同时，又与部分农民起义军暗中联系。他们这样做，既是要减轻农民起义对他们的威胁，又是要把农民革命斗争纳入地主阶级内部斗争的轨道，增强自己同高俅一派斗争的力量；既为自己在地主阶级内部斗争失利时留下一条退路，又为东山再起打下一个基础。

在地主阶级内部的斗争中，宋江一派尽管用尽“权谋”，机关算尽，仍然是连连败阵；而高俅一派则穷追猛打，步步紧逼。宋江“杀惜”以后，流配江州，由胸怀“凌云志”的“刀笔吏”，变成了“贼配军”，向上爬的路被堵死了。他满腹牢骚，“一时间酒后狂言”，浔阳楼误题“反诗”，又被高俅一派抓住，大作文章，定成死罪。至此，不仅他的由“刀笔小吏”逐级升迁的希望完全破灭，连性命也保不住了，“不由宋江不上梁山”。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宋江才不得不选择了公开投靠农民起义军这条道路。

宋江上了梁山之后，地主阶级的反动立场并没有丝毫改